



# 读书人的 出世与入世

资中筠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读书人的 出世与入世

资中筠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资中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

(“在水之湄”系列)

ISBN 7-5004-3299-2

I. 读… II. 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855 号

特邀编辑 唐思东  
责任编辑 曹宏举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海洋  
技术编辑 李建 薛正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世纪太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32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这本小书收集了我自 1996 年以来断断续续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非学术性文章几十篇。与上一部《学海岸边》中的文章一样，都是业余即兴之作，是在写“大部头”的夹缝中草就。我有时羡慕有些文史界的学者，他们的随笔往往与专业相联系，有的是学术研究的副产品，有的就是介乎论文与随笔之间，都蔚然成章；我则平时思想驰骋所致而有意形诸笔墨的，与专业相去甚远，这种写作在注意力和时间上都与专业有矛盾，因此平均“年产量”少得可怜。本书的文字大多完成于退休之后。既然已经退休，原也无所谓“业余”之说，并没有人加于我非完成不可的任务。但是越是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有了相对的自由，就越

痛切地感到来日无多，未酬的“壮志”真不少。于是自己“策划”出一些“课题”，陷于其中方知难度和规模远超出原来的估计，自讨苦吃，自套枷锁，但已是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兴之所致的文章都是在夹缝中写就。其实随时涌上心头的“灵感”，以及可写的人和事远不止这些，但由于尚未从枷锁中摆脱，仍然有待于继续从夹缝中挤出来了。

我的专业号称是“国际研究”，重点是美国。但近年来思考的问题离当前“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之类越来越远，兴趣越来越杂。兴趣杂原是本性，现在也算是一种回归。这“杂”就反映在这本集子的题材和体裁上，有的接近论文，有的纯属随感，最长的近万字，最短的几百字。给这样一个集子起名颇伤脑筋。我原名之为《说东道西》，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拉拉杂杂，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之谓；其二多少与本人的工作经历有关，见闻、读书和思考所及还是驰骋于东西方之间。同时对历史又情有独钟，喜与古人神交。从心情来讲，常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所以曾想起名为《怆然集》，又觉过于低沉。但是这些名字出版社都不喜欢，当然是从读者面考虑。最后在几经磋商，互相妥协之下，就选用了其中一篇“平戎策与种树书”的副标题为书名。以一篇名全书，这种惯例也是有的。另外，中国读书人的出处(chū)一向是我思考的问题之一。对“出世”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消极、无奈的选择。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长河中，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读书人入世惟一的出路是做官。而一旦入仕途，忧国忧民之士能一展抱负的不多，却难免被迫摧眉折腰。况且机会总是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出世”精神是一种维持人格独立的退路，是心灵的净化剂。因此有狂狷，有淡泊宁静，有安贫乐道、心胸豁达这些秉性，如果没有这一精神上的退路，那么



只有人人不择手段地在宦途的独木桥上挤压、竞争，只剩下《儒林外史》中那些猥琐形象，中国的道德文化面貌可能是另一个样。今天的读书人出路当然广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个以什么精神对待进退出处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书名还是切题的。

文章虽杂，却于不知不觉间流露一种一以贯之的追求，老而弥坚。谓我何求？也说不清楚。一定要用文字来概括，那就是求真、求善、求美。这样一说显得既老生常谈又大而无当，但在我自己都有特殊的关注点。我从学龄前开始所受的最初的做人的教育就是诚实，三岁记事，受到母亲第一次家法威胁是被怀疑说了假话。长而学书，从四书中的“正心诚意”、“慎独”到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无不强化“真诚”二字。然而，离开校门以后，却不能担保永远只说真话，只是被迫说“违心”的话时总是感到非常痛苦。后来在从事学术著述中自己确定一条原则：若是真话不能全说，至少明知是假话的不说。好在毕竟时代不同了，只要无所求，不说假话还不致罹祸。不过除了独善其身之外，在漫长的岁月中，见证了太多的伪善、哗众取宠和自欺欺人。奸商、政客固无论矣！号称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是什么状况呢？从本应天真单纯的儿童、学生时代起就被迫按“应该”的说而不是按真心所想的说，以致“违心”之论已经被社会接受为“人之常情”，甚至分不清是自愿还是被迫，那会是怎样的社会和国家？凡此种种，令我痛苦，令我心忧，止不住要发出呼唤，呼唤求真。科学地说，凡是真的不一定是善的和美的，因为客观现实不一定都美好。但是求真的精神，诚挚的心灵总是善的、美的。远古的人类从蛮荒中走出来，逐渐告别原始的纯朴，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同时在物欲横流中，人性和自然界一样受到太多的摧残、扭曲和污染。我相信，一定程度的归真返朴能使世间少一些假、恶、丑，变

得更加文明和美好。

我还相信，人之异于禽兽者，不但在于有思想，还在于能够为某种理想和追求进行锲而不舍的努力。世间如许令人惊叹的成就都记录了人向极限挑战、不断超越自己、攀登高峰、发挥创造力和智慧的过程。科学的探索、艺术的创造，乃至体育竞技和探险，莫不如此。我相信存在天赋的差别，但我更敬重一切为臻于至善和完美的执著努力。因此，从戏台上能熟练而准确地翻跟斗的龙套到大艺术家到学问深不可测的大师，以及任何普通人孜孜以求，付出超常的心血和劳动取得一定的成绩，都能令我钦慕，因为他们所达到的成就都凝聚了常人所不及的辛勤劳作。反之，种种靠炒作包装，既没有才华又没有劳作基础的“闪亮”，都令我生厌。这不仅是个人的好恶，而是从以上的信念而产生的忧思：如果不劳而获暴利虚名成为主流，追逐浮华成为时尚，不但是审美观的低俗化，而且将是精神的堕落，使文明倒退。

我这一代中国人于内忧外患之中经历了种种民族悲喜剧和荒诞剧，个人命运随之沉浮。本人又多一些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在说东道西之中潜意识地难免相互参照，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思。到了这个年龄，于个人而言早已与世无争，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人事天命，总不能释怀。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也不是超然物外的，落实下来，就在这片土地上。涉及一些沉重的话题，不合时宜之见如鲠在喉，一吐则难掩锋芒。呜呼！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

本人忝列“学术界”，每每感到心虚。近世中国的文科知识分子，能以一生倾注于学的极少。比我老一代的师长辈，在青壮年时已有丰富的积累和著述，卓然成家。但是以后几十年大多



在批判和否定前半生的成就中度过。其中幸而寿者，在耄耋之年还能勉力著述，传其薪火，酬其宿志。我则少年志于学，并不比孔夫子晚，但可以说是青壮年失学，腹笥既单薄，也还没有来得及如前辈那样作出任何成绩，倒赶上一同对过去所学的批判和否定。那一点点微薄的学识竟成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及至有机会实现夙愿，挤进学界，已年届半百。虽奋力恶补，常捉襟见肘，只能老大徒伤悲了。晚生于我的学子，少年时有一段失学，基础较差，但是机会来时仍然风华正茂，有志者还来得及补课，施展的天地也要广阔得多，当然又须经得起新的“世风”的诱惑和考验。我仰慕前辈的学养和积累，自叹望尘莫及；又羡慕后辈的精力和机会，感慨时不我予。但是一息尚存，伏案已成惯性，不能自己。后半生经过否定之否定，似有所悟，尽管不成系统，总是一吐为快，遂陆续成篇。近来无端常想起大学一年级时国文老师出过一个颇为冬烘式的作文题：“‘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当时“说”了些什么交的卷，已完全不记得，如今却发现“思”和“学”竟是我闭门陋室之中，赖以度日的主要寄托了。

我对自己的文章能有多少读者向来不抱奢望。承蒙沈建中小友自告奋勇为促成本书以较为精致的面貌出版多方努力。他以摄影家的审美眼光对书的装帧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为寻找合适的图片不辞辛劳，会同美编的共同努力，为本书增色不少。沈君任职于金融界，却对正在或行将消失的一些老人及其所体现的文化有特殊兴趣，纯粹出于非功利的追求和爱好，而能这样认真执著，令我肃然起敬，特致真诚的谢意。

资中筠

千年之交于芳古园陋室



# 目 录



自序 / 1

“平戎策”与“种树书”

——中国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 1

对大学生辩论竞赛质疑

——有感于宋朝汪藻的文才 / 12

想起了“咏絮才” / 17

与师友同游水木清华

——《世纪清华》序二 / 20

有感于冯友兰先生的“反刍” / 26

三联书店与当代学术文化 / 30

人格与国格孰先? / 34

袁同礼

——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 / 38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 50

黄遵宪的《新别离》诗 / 78

信、望、美的追求

——《啊,拓荒者!》再版序 / 83

热潮退后话《廊桥》 / 90

五四运动与《列女传》的联想 / 97

男子中心社会的“语境” / 103

食洋而化,惠及学子

——评《美国文化与文学选集》 / 109

雪泥鸿爪化作碑林

——《世纪肖像》影集 / 117

一定要“团圆”到皇帝身边吗? / 122

怎么就没有“正好”过? / 127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 134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与美国独立 / 139

忆海伦·斯诺 / 143

与保尔·罗伯逊同台演出 / 156

信誉能否靠良心来保证?

——美国大学中的“信誉规则”制 / 162

漫谈美国人的行为文明 / 168

东西方国家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 172



## 鲍大可

——中美之间一座特殊的桥梁 / 178

本杰明·斯波克医生访华逸事 / 195

“成功为失败之母” / 200

“台后流泪,台前显贵” / 205

对呼唤蓝天的共鸣 / 209

煞风景谈 / 214

图书馆礼赞 / 218

## 何谓素质教育

——忆母校天津耀华中学 / 223

对好编辑的体验 / 229

闲话电话 / 234

## 弹不好有感

——不算乐评 / 239

## 讲和也需要英雄

——由拉宾之死想起的 / 245

外国问题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困惑 / 250

爱国的坐标 / 259

## 关键在于立宪

——洋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称帝的再思考 / 271

## 老问题,新视角

——美国学者写义和团 / 285

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 / 298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 309

从方孝孺与布鲁诺之死看中西历史轨迹 / 318

# “平戎策”与“种树书”

——中国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



「平戎策」与「种树书」

中国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有许多隐逸、放达的佳话。从诗词来看好像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细细一看，却不尽然。这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有人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可谓高度概括。

最典型的放达当属魏晋南北朝的名士。其产生的独特背景当然是长期的乱世。政权更迭之频繁，使一个人一生可以经历几个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很危险，就是在本朝，宗室夺权也很激烈，一不小心就“站错队”。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气节失去了依托，该把忠诚给谁？谁是值得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换代于国于民何干？对士大夫来说，从老庄学说中找出路比

较顺理成章,玄学、清谈于焉成风。有所谓“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并非出世的隐士,大小都做过官。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贤”而言,其中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的山涛,先仕魏,后仕晋,官至吏部尚书。嵇康与曹家有亲,在魏是做过官的,不过拒绝仕晋。刘伶原也在朝,因倡导“清静无为”与晋武帝主张不合而被罢官。那王戎则不但做了高官,而且是出名的守财奴。所以这些名士确实有反传统的处世哲学,以为世所瞩目的怪诞言行表达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但是并不是真的淡泊名利。所谓“大隐隐于朝市”,他们多半是“隐于朝”,也就是一面做着官,实际不做事,照样游山逛水,纵酒清谈,身在官场,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谈误国”之讥。如果不在位,如何误得了国?这种情况只有在魏晋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为高官的职务为几大家族所垄断,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权,同时也只有出身名门,才能成为名士,一句俏皮话、一种怪癖都有人传颂,还有人记录,流传后世。若是一介寒士,谁来注意呢?以那个长醉装疯“能为青白眼”的阮籍为例,时下已被用滥了的“青睞”一词即典出于他。主要因为他是名士,时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倍感荣幸,这才成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就可能被认为有眼疾,谁理他呢?还有那先于现代西方1800年提倡裸体的刘伶(这倒可以为“西学东源论”做一旁证),一丝不挂在家接待客人,还说是“以室为裤衣”,“诸君何为人我裤中?”若是穷措大为此,大约是要以有伤风化捉将官里去的。所以放诞和名士互为因果,因放诞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为放诞才有意义。不过,同为“竹林七贤”,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识超常之人,而且独具风骨,惟其如此,才能把世态看得那样透,那样不屑同流合污。嵇

康可以说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咏怀诗》所表现的那种深刻的悲愤和绝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极高境界。这批名士的行径带有个性解放的倾向，但只能是消极的而不是奋进的。

处乱世暂隐以待机而出是有抱负的读书人常取的道路，自秦汉以来每当末代都不乏这样的人，诸葛亮是先处后出的典型。在那种情况下“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可能是真心话，但是他决不甘心就此无所作为，否则见了刘备怎能有那样现成的“隆中对”？也有下决心避世不出的如东汉严光(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同学”，无论汉光武如何敦请、礼遇，终不受官而隐于富春江。后人讥严子陵矫情，说他“一着羊裘便有情”，因为他披着羊皮袄在江边钓鱼，被刘秀派去的人发现，若是和渔夫一样穿蓑衣，就根本无处寻，也就无人知。不论此说确否，隐士而知名总有各种途径。在那个时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这种风气东汉已有，李固与黄琼书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是黄琼屡征不应，李固劝他该见好就收了，免得越晚出来，人们的期望就越高，落盗虚名之讥。那前提是终究要出的。这个过程在晋朝称为“养望”。“养望”最成功，“隐”与“出”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是东晋谢安。他隐居东山近二十年，享尽诗酒山水之乐，自己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谢家子弟个个如芝兰玉树，才华出众，在朝在野都表现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广为传颂，而且争相效仿，有点“领导新潮流”的味道。那“隐居”是一点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坚决不应召而名望更高，以致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呼声。到了晋穆帝时，他觉得时机已到，居然应召出仕了，在位大约也是二十几年。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

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权力。在他主持朝政时内举不避亲，重任侄子谢玄，立下了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不世之功，谢安本人由风流名士成为一代风流名相，谢氏家族的显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见疑，功成身退之古训，已经开始准备退路，只是还来不及再归隐东山就死于任上。终谢安一生可谓“隐”与“仕”都极尽辉煌，死也恰得其时，令后世读书人羡慕不已。不过这是特例，几乎绝无仅有。他的子孙就没有那么幸运，或隐或仕既没有那么潇洒、自由，也没有那么辉煌、显赫。在皇权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终，包括以山水诗闻名的谢灵运和谢朓都未得幸免。其中有人是自己进退失据而招祸，但有的祸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现代名言：“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

所以兴于东汉（再早期的暂时不论），盛于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之风是“士”为保身而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东汉有那么多“高士”、“逸民”，与王莽夺权而未能长久、东汉朝政清明的时候又不多有关。而朝廷方面却有以“举逸民”为德政的风气，下至一方太守，上至皇帝，高士而不能用于，面子上总不大好看，总要下功夫软硬兼施地去请，甚至去逼，隐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经在朝的忠臣却常不见用，甚至身遭刑戮。就说李固，他忠心耿耿为朝廷求才，终于说动并举荐黄琼出来做官，自己却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灭门之祸，只有一个小儿子逃脱，连黄琼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观者寒心？因此才会出现一批真心诚意坚决不仕，终老山林的“逸民”。他们与魏晋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当布衣百姓，藐视王侯，宁愿以放猪、采药，甚至当长工为生，如蓬萌、梁鸿者流。

与“隐于朝”的魏晋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隐得彻底的是陶渊



明。从全部陶诗来看，他不是—个没有济世抱负的人，诗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鲁迅所引的一处。但是无论如何，“金刚怒目”决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论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还是从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险恶，对历代良士之不遇感触极深，不存可以有所作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洁，与那名利场就是格格不入。“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于王、谢之类的世家，既没有那样的机遇，也没有那样的麻烦。他与黎民百姓同感离乱之苦，才幻想出—个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来。他是真淡泊、真隐逸，归于田园并非“养望”，只是想逃到皇权统治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虽然也离不开酒，却不必故作怪诞引人注目之举。那个乱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园诗、山水诗，也开创了—中国读书人—种独特的保持独立人格的方式。

那么处盛世当如何？李白是—种典型。我少时读了那么几首《三百首》里选的李白诗，—方面慑于那海阔天空的气势，—方面惑于“诗仙”之名，把他想成—个真的志在“散发弄扁舟”，或人山游仙的人，所以读《与韩荆州书》觉得大煞风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够肉麻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识韩荆州”，实际“识韩荆州”就是为了“封万户侯”，因为“—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还露骨地要求“收名定价于君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仙”怎么能那么庸俗？这是少不更事之见，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极重的，他做梦都想上“天子堂”。他确实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业，情之所系在长安。谢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羡慕之情溢于诗文之中。但是时代和门第都不允许李白效谢安那样“养望”待出，而他自负才高，又不屑于